

民族交往与发展

MINZUJIAOWANGYUFАЗZHAN

民族出版社

杨盛龙 白正梅 孙懿 等著

民族交往与发展

MINZUJIAOWANGYUFAZHAN

杨盛龙 白正梅 孙懿 等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族交往与发展 / 杨盛龙等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105 - 10767 - 4

I. ①民… II. ①杨… III. ①民族关系—研究—中国
IV. ①D6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7147 号

民族交往与发展

策划编辑: 于玉莲

责任编辑: 于玉莲

封面设计: 晓玉工作室

出版发行: 民族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电 话: 010 - 64271909 (编辑室)

010 - 64211734 (发行部)

网 址: <http://www.mzcbs.com>

印 刷: 北京迪鑫印刷厂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300 千字

印 张: 10.375

定 价: 30.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767 - 4 / D · 1867 (汉 280)

该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流变与分布格局	7
第一节 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流变	7
第二节 中华各民族的形成与发展	31
第三节 中华各民族的分布格局	52
第二章 民族交往的历史考察	63
第一节 各民族政治上的交流往来	63
第二节 各民族经济上的相互促进	88
第三节 各民族文化上的相互交融	99
第三章 新中国成立后民族交往的经验教训	108
第一节 党和国家对民族交往的引导	108
第二节 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与发展	124
第三节 民族交往的教训反思	132
第四章 改革开放与民族交往	145
第一节 民族地区对内对外全面开放	145
第二节 国家战略调整对民族交往的影响	154
第三节 改革开放搞活与民族交往新格局	163
第五章 民族政治交往	168
第一节 促进民族政治交往的政策措施	168
第二节 少数民族在我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180
第三节 民族政治交往的和谐发展	191

第六章 民族经济交往	202
第一节 国家对民族经济交往的大力促进	202
第二节 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互补与支援	214
第三节 民族优势特色产业与经济交往	227
第七章 民族文化交往	239
第一节 国家对民族文化交流的积极推进	239
第二节 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与互补	252
第三节 民族文化在交流中发展繁荣	262
第八章 民族社会交往	272
第一节 现代化进程与少数民族社会保障	272
第二节 民族教育科技对民族社会交往的作用	278
第三节 民族散居化与城市化进程	282
第九章 新形势下民族交往的特点与趋势	288
第一节 新时期民族交往的特点与作用	288
第二节 民族交往的新情况新问题	306
第三节 民族交往的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	311
后 记	322

绪 论

民族形成于一定的区域，每个民族都有相对集中的聚居地。然而，各个民族却又不是孤立于世的，必然会在社会生活中交流往来，相互影响。民族本身包含着社会的各种现象和因素，民族的发展必然同社会各种现象和因素相联系。人类文明不论哪种文明都是由多个族群的不同文化融会而成的。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任何民族都不会自我封闭于一定的圈子内，必然与其他民族发生交流往来。有比较才能有鉴别，有比较才能知不足，各民族只有对外开放，在与其他民族的交流往来中，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才会不断向前发展。各民族在交流往来中，对照外面的世界，吸取别人的长处，学习先进文化科学技术，为我所用，不断丰富自身。各民族在向外输出文化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发展着自己，在交往中共同发展。

考察我国民族交流往来的历史与现状，梳理民族交流往来的脉络，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从古代起，各民族间就互相交流往来。我国塞北以及西北地区、青藏高原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历史上长期实行游牧，中原汉族地区以农耕为主，游牧文化与农耕文化有很强的互补性，一直是在和平或暴力的交往中发展的。游牧文明需要农耕文明的粮食、布帛和金属器具，农耕文明需要游牧文明的马匹和皮革，北方和青藏高原需要南方的茶叶，通过互市来满足各自的需要。从云南通往青藏高原的茶马古道，是这

种互市贸易的典型代表。从古至今，回、汉等民族的一些商人将中原的农产品贩运到青藏高原、黄土高原等牧区，将牧区的畜牧产品贩运到农区，使农耕区与畜牧区之间互通有无，互相交流。横跨亚欧大陆的古丝绸之路，更是中外各民族交流往来的通道。

从秦汉到元、明、清，历代都有不少汉族人通过屯垦、移民、流亡等形式移居边疆各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交错杂居。明朝，汉族从东中部聚居地区向四周移居，中央政府以军屯、商屯、民屯等形式，将大量汉族迁移至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汉民族的农耕文化向四方扩展，汉族发达的经济文化向边疆地区传播，一些汉族人融入少数民族中。秦汉以来，北方一些游牧民族向中原进发，有的民族入主中原，有的民族融入汉族中，一些民族从西北地区及青藏高原迁徙到云南、贵州等地区，一些民族从黄河流域迁徙到中南、华南、西南等广大地区。元代、清代，蒙古族、满族成为统治民族，其成员或作为职官，或作为军队官兵及家眷，几乎流向全国各地区。随着民族间的不断交流往来，各民族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互相影响，一些民族甚至互相融合。历史上，汉民族更多地吸收融合了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有些汉族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驻防、屯垦、开发，被那里的少数民族同化而融入其中。

元朝、明朝实行土司制度，保留各少数民族内部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变，以保证全国范围内政治上的统一，有利于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清代在僻远闭塞的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然实行土司制度，以团结各民族上层，保卫和巩固边疆，维护国家的统一；在与汉族地区邻近的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政策，即废除少数民族中的世袭土官，改由中央政府派遣流官前往任职，使其在政治、经济生活方面与内地中原地区更多交流与相融，促进国家巩固和民族发展。

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分分合合的历程中，形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国传统文化“和而不同”的概念，

是一种非常高的境界。如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设想，人们在欣赏本民族文明的同时，也能欣赏和尊重其他民族的文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就能达到一种和谐，就会出现持久而稳定的“和而不同”。中华民族在形成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吸收多种文明，达到了和谐共生。

历史上，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民族之间的交往不断扩大，交往的形式是多渠道的。既有各族人民之间生产生活需要的直接交往，有互市贸易、长途贩运等交流往来，也有通过各民族之间的掠夺、战争和征服而产生的交往，还有通过臣服、贡赋、赐赠等的间接交往。这些交往都加强了民族间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前进，民族间的交流往来不断增多。新中国成立后，各民族生活在和平的环境中，交通条件大为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随着交通通信的进一步发展，城市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建设步伐加快，人们的联系交往更加方便快捷，民族间的交流往来进一步扩大，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影响的概率更高，经济社会发展更快。

新中国成立后，新疆、西藏以及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了保卫边疆和建设边疆的需要，解放军的一些干部、战士留在了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干部、战士大部分是汉族，也有少数民族。因工作需要，他们学习当地少数民族语言，与当地少数民族群众打成一片，密切了党和政府与各族人民群众的关系，为开发边疆、建设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派遣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访问，进行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民间文学的调查，密切了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关系，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国家开办民族院校，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和干部，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方面专业人才。组织少数民族各阶层人士到首都北京及内

地和沿海发达地区参观、访问、学习，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开阔他们的眼界和思路，扩大民族间的交流往来。

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地域辽阔，地广人稀。为了开发和建设边疆，中央政府和内地各省市陆续派遣一些干部、科技人员、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毕业生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支援开发建设，为那里输送了一些管理干部和技术力量。这些举措扩大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交流。

人口流动是双向的，边疆少数民族人员也向内地、沿海和城市流动。国家在北京、成都、武汉等大城市共办有 13 所民族院校，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办少数民族班，采取优惠政策扩大招收少数民族学生，大量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科学技术人才。这些学生毕业以后，大部分返回民族地区工作，也有一些在内地城市工作。各少数民族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政议政，体现少数民族当家做主。少数民族成员到中央及各级人民政府机关担任工作人员。因工作需要，从中央到省市设立一些民族工作部门以及民族研究、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文字翻译和新闻出版等机构，吸收一些少数民族人员到城市落户。近年来，有些大城市又新辟一些诸如“民族园”之类的旅游景点，招收大批少数民族青年。特别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边疆少数民族进入内地城市和东部沿海地区从事商业和劳务活动，内地和东部沿海的汉族商贾流动到西部边疆地区经商，到边境地区从事边境贸易，人口流动有增无减。

少数民族人口从原来的聚居区不断向全国各市县流动。内地和沿海，特别是城市的少数民族成分数、人口数不断增长。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全国已有 11 个省区市拥有 55 个少数民族成分，未达 50 个少数民族成分的省区只有 3 个，已有 29 个少数民族在大陆所有省区市有分布。维吾尔族 1964 年分布在 297 个县，1982 年分布到 478 个县，1990 年以后分布更广。不同民族间的通婚率呈上升趋势，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异族通婚率在 10% 以上的少数民族已达到 49 个民族。人口的大范围流动，对于增进

各民族间的相互了解，促进经济文化发展，繁荣城市市场，带动民族地区发展，提高人口素质，都有积极作用。

移居到内地、沿海城市的少数民族，仍然保留着浓厚的民族特点、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各民族平等相处，互相尊重，和睦互助。他们中有的与汉族或其他民族通婚，学习汉族的语言文化，受着城市化的影响。他们起着窗口作用，向外宣传和传播本民族文化艺术，发展着民族传统文化。他们与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有着血肉亲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于加强少数民族地区与内地、沿海城市的联系，对于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都有积极的作用。各民族的大交流，促进了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促进了各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进步。

对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流变与分布格局作一番梳理，对各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往来做历史考察，会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各民族的交流往来有那些特点，有些什么经验教训，少数民族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确立与发展，国家对民族交往的引导，国家战略调整对民族交往的影响，民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互补与支援，各民族文化的互相影响，民族交往对民族发展的促进作用，民族交往中存在一些什么样的新情况新问题，怎样解决这些问题，预测民族交往的发展趋势，对今后的民族交往与发展提供一些对策建议，等等，是本课题要集中梳理、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一个民族的文化，只有与更为丰富多样的民族文化相交流相交融，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世界的，才是民族的。与世界文明相交融，民族的文化才能长盛不衰。如果故步自封、惟我独尊，对其他文化视而不见，拒绝与别的民族文化交流，是不明智之道。只有互相理解、共享、交流、交融，才是各民族文化共同发展繁荣的道路。

应该解决好各个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相得益彰、共同繁荣。各

民族在相处中，一方面不要妄自菲薄，一味谄媚外面；另一方面不要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也不要以本民族文化的标准去评判其他民族文化的“优劣”，断定其进步与否。各民族必须全面对外开放，必须与各种文化和谐相处，与各种文化更多交流往来，做到胸怀坦荡，眼界开阔，拓宽思路，博采众长。

任何民族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交往中互相学习而发展的，只有开放的民族才可能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要更进一步扩大对内对外开放，加强东中西部的交流往来，大力发展与国内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往来，扩大与周边各国、与世界各国、与国际上其他民族的交往，大力促进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往。要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城乡互动，以城市辐射农村牧区，加快农村牧区建设发展。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积极引导，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对外开放，积极扩大民族交往，增进民族间的交流往来，引导和促进各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促进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只有加强交流往来，各民族互相学习，各民族经济社会才会更好更快发展。

第一章 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流变与分布格局

中华大地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众多的民族在这里繁衍生息，给我们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活动在中华大地上的众多民族，包括已经消失的民族，在历史的长河中通过不断密切相互之间的关系，留给我们两大遗产：一是多民族统一的中国，一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我国今天的 56 个民族是历史上众多民族长期融合发展的结果。我国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就是一部各民族（包括历史上已经消失的民族）共同缔造中国历史，同时也是历史上众多民族不断融合，古老的民族消亡、新民族诞生，并在近代抵御列强入侵中由自在民族转化为自觉民族，各民族以中华民族之名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

第一节 中华各民族的历史流变

中华各民族的形成，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 自夏至秦汉的统一是第一个阶段，作为中华民族主体的汉族在这一时期形成；2. 三国至隋唐为第二个阶段，中华大地上的各民族经历了第一次大融合；3. 五代至元为第三个阶段，在第二次民族大融合的

基础上形成了众多现代民族；4. 明清至近代是第四个阶段，中华各民族在长期不断融合的过程中完成了凝聚历程。

一、秦汉的统一与汉族的形成

在中华大地上很早就有人类活动。云南元谋人（距今 250 ~ 200 万年）、蓝田人（距今 110 万年）、北京人（距今 40 ~ 50 万年）等古人类的发现即可证明。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这些古老的人类创造了灿烂的优秀文化，并和传说中先秦时期华夏、西戎、东夷、南蛮、北狄的民族分布形成对应。

公元前 221 年，兴起于西部地区的秦国先后统一了韩、赵、燕、魏、楚、齐，结束了中华大地上战国纷争的局面，称霸一方的秦国由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秦王朝。秦王朝虽然立国短暂，但由秦王朝开创的“大一统”局面却为其后出现的汉朝继承并有所发展，华夏族因为汉朝数百年的统治完成了凝聚的过程，并因此得名为汉民族。

在统一六国之后，秦王嬴政在统治制度、经济文化等方面采取了许多前朝未曾采用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不仅使中国走上了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漫漫长路，而且也为华夏族的进一步凝聚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心目中的“天下”开始变为了由夏、夷构成的“二元”结构。

在统治制度方面，确立皇帝的最高权威和实施郡县体制是秦朝的两大贡献。史载：“秦初并天下……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王曰：‘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

曰皇帝。他如议。’……制曰：‘朕闻太古有号毋谥，中古有号，死而以行为谥。如此，则子议父，臣议君也，甚无谓，朕弗取焉。自今已来，除谥法，朕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① 伴随着皇帝绝对权威地位的确立，秦王朝“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对中原地区实施直接管理，之后又将郡增加到了四十余个，从而结束了中原地区诸侯分立的局面，实现了政令的统一。同时，在“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的辽阔地区，“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②将前代“九州攸同”的愿望变为了现实。华夏族不仅在政治制度，而且在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实现了统一，“秦人”称呼的出现即是这种高度统一的表现之一，同时也表明华夏族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凝聚过程，开始以一个民族共同体的姿态与周边其他民族发生关系。

虽然嬴政希望自己的皇位留传万世，但遗憾的是秦朝仅仅存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被汉朝取代了。建立于公元前 206 年的西汉，经过数代皇帝的共同努力，不仅实现了对中原地区统治方式的划一，使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而且也建立起了由郡县、属国、特设机构、“藩臣”四个不同统治方式构成的天下统治体系。其疆域范围大体是东起朝鲜半岛东海岸，包括了朝鲜半岛中部以北地区；西至帕米尔高原；北达贝加尔湖之北；南到今越南北部的辽阔地区。伴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大，在和其他民族的交往过程中，“汉军”、“汉兵”、“汉吏”、“汉人”的称呼开始出现。如《汉书·李广利传》记载：太初四年（公元前 101 年），李广利率领军队第二次进攻大宛，大宛的贵族杀其王希望和李广利订立和约。因为此是李广利失败之后的再次进攻，其本意并不愿意和解，但“闻宛城中新得汉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不得已只好答应了。其中所谓的“汉人”就是指华夏人。“汉人”称呼的出现，说明华夏

① ②《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族经过秦代的发展，最迟在汉武帝时期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值得注意的是，华夏族改称为“汉族”，并不是其本身发生了质变，更不是形成了一个民族，而只是名称的改变。

二、三国至隋唐中华民族的融合与发展

公元220年，东汉为魏、蜀、吴三足鼎立所取代，中华大地出现了分裂的状态。公元265年，在魏的基础上形成的西晋王朝虽然在统一蜀、吴之后实现了“大一统”，但时间短暂，永嘉年间（307~312）以匈奴刘渊建立汉政权为开端，北部中国出现了“五胡十六国”先后更替的局面，西晋残余势力建立的东晋只是偏居江南一隅。公元420年，南朝宋取代了东晋，其后是南齐、南梁、南陈各朝依次更替，北部则是鲜卑建立的北魏实现了中国北部的统一，其后又依次分裂为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公元581年，在北周基础上出现的隋王朝终于实现了中国“大一统”，但时间短暂，为618年建立的唐王朝取代，中华大地由此进入了又一次大统一时期。三国至唐，是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发生重要变化的一个时期，不仅出现了一次民族大融合，而且传统的民族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中国疆域的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影响。

由于分裂状态的长期存在，分布在边疆地区的一些民族成为各政权争夺的对象，而为了避免为其他政权所用，迁徙这些边疆民族就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对边疆民族的迁徙虽然在汉代就已经存在，但多是在边疆民族的主动要求下进行的，如闽越、东瓯部众向江淮流域的迁徙，南匈奴向北部诸郡的内迁等都属于此种。魏、蜀、吴三足鼎立之后，对边疆民族的迁徙成为一种经常采取的政策，尤其是魏、蜀两政权对分布于西部地区的氐、羌就经常采取迁徙的政策。早在曹操时期，为避免汉中的武都氐为蜀汉所

用,“徙氏五万余落出居凤翔、天水界”。^① 魏建立之后,武都太守又先后迁徙该地的汉、氐万余户于京兆等郡;公元235年,武都氐苻双领众六千余人降魏,魏将其安置在临渭(今甘肃天水)。^② 落,等同于中原的户,如按照一户5人计算,则仅这几次迁徙就有近40万人。

正是因为曹魏政权不断向关中地区迁徙边疆民族,进入西晋时期以后,陕西、甘肃东部、山西等地已经呈现民族大杂居的状态,入居这些地区的民族被史书称之为“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其中匈奴分布在以并州(今山西)为中心的凉、雍、幽各州,人数多达40万人。《资治通鉴》卷八十一对民族迁徙的状况有这样的记载:“汉、魏以来,羌、胡、鲜卑降者,多处之塞内诸郡。其后数因忿恨,杀害长吏,渐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钦上疏曰:‘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内及京兆、魏郡、弘农,往往有之。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渐徙内郡杂胡于边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此万世之长策也。’帝不听。”而《晋书·江统传》则载:“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皆为戎居”、“戎狄居半”一方面是对内迁边疆民族人口较多的描述,另一方面则是对民族迁徙所造成的大杂居程度的粗略判断。民族大杂居状况的出现,为民族之间大融合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而边疆民族在内地纷纷建立政权,争夺“中国正统”则为民族大融合提供了催化剂。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大地上统一的局面重又为分裂所代替,由众多民族分别建立的数十个政权,或入主中原,或雄踞

① 《三国志》卷十五《张既传》。

② 《三国志》卷二十五《杨阜传》、卷二十六《郭淮传》。

一隅，为争夺中原的统治权而上演了一幕幕大融合的历史画面。所谓“五胡乱华”、“五胡十六国”即是史书对当时这种局面的描述，虽然带有民族歧视的因素，但确实反映了当时民族间互相交融的实况。“五胡”即匈奴、鲜卑、羯、氐、羌。“十六国”则是指以匈奴人为主建立的汉（前赵）、夏；以卢水胡为主建立的北凉；以鲜卑为主建立的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以羯为主建立的后赵；以氐为主建立的前秦、后凉；以羌族为主建立的后秦；以氐人为主建立的成（汉）；以汉人为主建立的前凉、西凉、北燕等政权。而实际上当时远不止这十六国，还有鲜卑建立的西燕、丁零建立的翟魏、拓跋鲜卑建立的代（后改为“魏”）以及吐谷浑等民族建立的政权等，数量达20余个。这些政权分布的范围包括了今天的陕西、山西、河北、河南、甘肃、宁夏、四川、山东、安徽、辽宁、青海、内蒙古等省区。十六国时期，各政权之间的争斗给社会经济带来了严重破坏，也带来了民族间的迁徙与融合，一方面大量边疆民族进入了汉族地区，使中原成为民族杂居的大舞台，他们由牧业改从农业、弃胡姓而用汉姓，与汉族通婚，逐渐和汉族融为一体；另一方面，大量的汉族人为躲避战乱或作为俘虏向北迁徙到边疆地区，改从牧业、胡俗，逐渐与当地民族融合在一起，从而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加速了民族间的融合与少数民族的汉化过程。拓跋鲜卑统一北方建立北魏政权之后，民族间的融合由自然状态变成一种自觉的强制性行为，其表现就是北魏拓跋鲜卑王朝迁都洛阳，并通过采取一系列的政策法律措施，使拓跋鲜卑在政治、经济、文化、语言、习俗等多方面和汉族趋同，内徙的拓跋鲜卑最终融合于汉族之中。

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一些民族，诸如匈奴、乌桓、羯、氐等消失了，成为了汉等民族的组成部分；而突厥等民族则在民族大融合中得到了壮大，成为隋唐时期影响我国民族关系发展的重要民族。

公元581年，隋王朝的出现结束了中华大地分裂的局面，继其